

# 全球视野下不同文明的碰撞

——《世界的交织——全球史，全球思维（16—21 世纪）》书评

马秀钰

---

**【提要】** 亚历桑德罗·斯坦齐亚尼的著作《世界的交织——全球史，全球思维（16—21 世纪）》立足于长时段和多区域的历史考察，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了全球史与哲学、社会学、语文学及经济学的关系，通过这些学科之间的互动，揭示了全球史在知识流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写作历史的方式一方面令人重新反思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全球史在促进对话与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全球史 全球思维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K1

**【作者信息】** 马秀钰，1985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00732。

---

全球史这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自诞生以来，以迅猛之势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史学研究的一股新的潮流和趋势。全球史以跨国的历史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其研究过程中不仅采用了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还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当前，世界上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全球史专业，一些研究全球史的专门机构也得以成立，为既有的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法国作家、经济史学家亚历桑德罗·斯坦齐亚尼 2018 年出版了《世界的交织——全球史，全球思维（16—21 世纪）》<sup>①</sup> 一书，为我们研究全球史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独特的视角。这本书并不是简单地向读者介绍全球史及其不同的思潮，而是通过论述全球史，重点强调知识与历史认知在全球层面的传播与流动，是我们研究全球史相关问题值得参考的一部有力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史这门学科的多元性发展。

斯坦齐亚尼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历史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教授全球史、历史研究方法、关联史等课程，还在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等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俄国历史、印度洋历史、劳动与奴隶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历史等，著有《土地资本——后世界的漫长

---

<sup>①</sup> Alessandro Stanziani, *Les entrelacements du monde-Histoire globale, pensée globale, XVI<sup>e</sup> - XXI<sup>e</sup> siècles*,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8. 下文简称《世界的交织》。

历史（12—21世纪）》<sup>①</sup>、《欧洲中心主义与全球史政策》<sup>②</sup>、《东方专制主义之后——从全球角度看欧亚的增长》<sup>③</sup>等代表性作品。

《世界的交织》是作者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致力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关于全球史的概览，让读者重新审视几个世纪以来导致历史书写产生多种范式的结构性变革。本书在法国出版之后，旋即在史学界引发热议。人们评价此书“用一种新的、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思考和书写了历史”，“巧妙地概括了不同世界之间的融合”，“对全球史领域内最关键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sup>④</sup>

步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紧跟全球化的浪潮，逐渐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在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开始将触角向外延伸。全球史领域内诞生了数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sup>⑤</sup>、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sup>⑥</sup>等。虽然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都采用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向读者展示整个世界的联系，但也在字里行间映射出作者的民族意识，或将欧洲文化“中心化”的倾向。为了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斯坦齐亚尼另辟蹊径，从16—21世纪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在全球框架内的联系入手，重新审视历史书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从时间尺度上来看，该书贯穿几个世纪；从地理尺度上来看，作者的观察横跨法国、俄国、蒙古、中国、印度等多个欧亚国家，广泛汇集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经济学领域内的多种重要思想，体现了作者厚重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以及对多种文献的自如驾驭能力。

法国史学大家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集合122位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写成的《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一经问世就在史学界引发热议，是2017年法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法兰西世界史》不同于传统的以法兰西共和国及其价值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而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解释法国史、书写法国史。这一体现历史多元论的尝试在《世界的交织》中得到了延续，作者提出，应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来书写历史，同时也要结合重要历史事件的社会政治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叙述世界历史的不同方式所引发的多样化思考。

《世界的交织》全书近300页，共分为10个章节。在引言里，作者主要介绍了全球史的主要思潮及其比较与联系，以及法国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作者指出，国别史研究往往都是从政治维度及区域、民族、殖民等层面，围绕着不同国家的“特性”来展开，突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到底应该如何来引导我们的子孙后代去思考历史？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也激发了研究者对全球史的热情。全球史兴起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几十年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史的主要目标通常也是对全球化的研究。从普世史到比较史学再到关联史学，

① Alessandro Stanziani, *Capital Terre: Une histoire longue du monde d'après (XII<sup>e</sup> - XXI<sup>e</sup> siècle)*, Paris: Payot, 2021.

② Alessandro Stanziani, *Eurocent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③ Alessandro Stanziani, *After Oriental Despotism: Eurasian Growth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④ *Les entrelacements du monde-Histoire globale, pensée globale, XVI<sup>e</sup> - XXI<sup>e</sup> siècles*, Revue de presse, <https://www.cnrseditions.fr/catalogue/histoire/les-entrelacements-du-monde/#tab-presse>. [2022-03-15]

⑤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 1914*,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3.

⑥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09.

全球史囊括了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使研究的角度更加去中心化，也令研究者们再次对编年史学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潮提出质疑。因此，全球史并没有强调西方思想在普遍性、科学性及技术进步等方面领先于其他领域，而是突出了不同价值观与不同方法之间的互动性。全球史提出了新的阐释，其中包括对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及其变革的新阐释，这些不再被视为西方世界独有的成就，而被视为漫长的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全球史回答的是当今全球化的问题；全球不同区域的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地推动着历史学家们不断提出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如何来撰写一部世界史，而不将欧洲置于这些变革的中心？这成为近年来困扰欧洲历史研究者的一个难题。

在《世界的交织》这本书的引言里，斯坦齐亚尼并没有对全球史的主要思潮分门别类地一一予以论述，而是通过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所引发的争论，引出了“我们的世界是否注定要被全球化”这一问题。该书的大获成功，在于史学与经济学的融会贯通，中国也由此吸引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史学家等多领域的研究者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的特性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让人们毫无怨言地工作，默默地进行资本的积累。“大分流”颠覆了韦伯的理论，却保留了其中的主要假设——“欧洲中心主义”。彭慕兰的研究仍是借助了公共土地私有化、工业化、资产阶级精神、个人主义等英国发展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因此，关于“大分流”的论战就是单一思想的后果：只存在唯一一种发展模式，即理想的资本主义。这种研究方法是众多汉学家予以批评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彭慕兰的研究抹杀了中国的特性。对此，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提出了重视其他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问题，这是关联史学的重大贡献，即它实际上指明了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关联史学没有将全球化视作一种冲突，而是将之视为不同世界之间的对话。关联史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欧洲的价值观和实践深受与非欧洲世界的互动和流通的影响。然而，关联史学忽视了社会等级在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探讨其作为全球史主要思潮之一的同时，斯坦齐亚尼也指出，全球史研究鲜有法国学者的踪影，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国的历史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在于法国的制度及政治环境。法国的历史研究通常只涉及法国自身，久而久之便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割裂。通过分析论述法国一些史学家诸如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施振高（Claude Chevalyere）、帕特里克·布琼等人的思想，作者分析了比较史、关联史以及交叉史研究方法的异同及利弊并阐述了写作本书的目的：介绍近年来的关联史学和全球史，而非提出关于历史实践的一种抽象的理论。简而言之，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提出史学作为一种关联学科的批判性、历史性的认识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史与历史哲学的关系。通过“历史有意义吗”这一贯穿了几个世纪的问题，作者指出，全球史是一种历史哲学。作者首先探讨了启蒙运动的全球性意义。以往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启蒙运动对世界的进步作用，强调了其“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其实启蒙运动是一种世界性的综合现象，只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表现成不为欧洲大陆所熟悉的模式而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回顾了18世纪众多欧洲的哲学家对中国等“异域”文化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历史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历史的用途等问题。作者指出，历史事件会对经受过政治思想浸润的哲学思潮产生强烈的影响。在第二章中，作者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与全球史的关系。在21世纪的全局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通过自诩为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而大肆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弗兰克（André G. Frank）和奈格里（Toni Negri）等。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全球化的，马克思思想一方面具有全球维度，另一方面将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全球史领域，以马克思思想为借鉴并不能局

限于沃勒斯坦等人的阐释。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将马克思视为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主要参考对象，而历史学、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了一项切切实实的研究大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时刻。西方世界内部也受到了不断增多的问题的威胁。在世界的每个地区，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趋势面临着增长的势头。对全球变革的敌意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不断增强。全球化被视为这场危机的根源，而民族国家被视为防止发生解体的主要办法。民族主义历史研究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发展至前所未有的顶峰。悲观主义在全球史领域内开始盛行，尤其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没落》可能成为关于全球史论述中最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但斯宾格勒等学者忽视了世界内部的联系。通过讨论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等人的观点，作者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从崇尚复兴思想的悲观主义转向了复兴自由主义。历史研究的方法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也在创造历史的方式上产生了对立，尽管当时学界已经实现了知识的流通。这些不仅对全球的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影响了思考历史和实践历史的方式。对历史记忆的追寻，激发了人们关于时间不可逆性的思考。真相、历史与表征之间的紧张关系占据了历史哲学大论战的核心地位。但这次，这种关系不仅与进步思想完全决裂，也与历史变革的重要意义产生了分离。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与亨利·鲁索（Henry Rousso）由此提出了历史思想和制度根基。对历史的认知成为众多研究的主题，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详细论述了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阿隆（Raymond Aron）、萨特以及福柯的“批判性”历史哲学：他们对资料和档案的客观性批判，对研究范畴和模式的批判，对评价和阐释的主观性的强调，等等。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方法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多样化形态，18世纪世界发生的变革也为人们思考历史与哲学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历史、全球性与社会科学”。19世纪的整体性和比较性的思想，对当今的全球史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不能把它们统统归纳进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范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潜心研究这一思想的学者中，马克斯·韦伯的参考价值并不亚于马克思。他的影响力至今在全球史研究及比较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重点探讨了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年鉴学派的研究等相关领域。斯坦齐亚尼首先分析了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在德国的兴起，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史学理论中的兴起。德国“第一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Friedrich List）、罗雪儿（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克尼斯（Karl Knies）等人在当时呼吁，不要将政治经济学与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的研究（当时还没有成为社会学学科）相分离，要考虑历史路径的多样化。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开始迈入一个新阶段。第二种以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已经开始致力于思考历史路径的多样性。在施穆勒看来，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桑巴特则比较重视“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以及隶属于不同体系的多种要素共存的可能性，这对布罗代尔及其他强调长时段理论的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韦伯同其他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发展了比较分析这一理论，建构了一种比较分析的框架，为西方世界的霸权及其理想类型的合理性服务。韦伯、桑巴特乃至一些全球史领域的后起之秀，希望重新提出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他们基本都是从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比较模式或全球性模式出发，或是通过强调某个非欧洲国家的局限性，来比较理想化的欧洲与某个非欧洲国家；或

是像彭慕兰一样，推翻比较的结果却保留进行比较的准则和变量。从中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并没有构成一个同质的立场，它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模式来表达：一种进行了等级的划分，另一种是普世的，但以西方价值观为出发点。无论哪种模式，连接历史与经济的线条永远是极其脆弱的。殖民主义与冷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经济学思维，经济与历史的联系被中断，甚至与政治和社会科学的联系也不再那么紧密。

为了理解法国史学家们在面对韦伯、王国斌及彭慕兰时表现出的怀疑态度，作者梳理了上述历史研究的思潮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年鉴学派以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作者指出，当前，从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到布琼再到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尽管有一些法国学者在全球层面取得了成功，也有不少的全局史著作问世，但全局史还是不能稳稳地扎根于法国学术界。法国历史包括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沿袭了涂尔干对德国社会学特别是韦伯的轻视。布罗代尔想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对这些思想做出超越，创造出一种真正的世界史。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首先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分期，比较这种研究模式同样并不令人满意。一直到现在，这种比较都在熟视无睹地将欧洲的框架强加于其他现实之上。顺着“大分流”的视角，这些现实被认为在过去与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制度和精神状态。这些史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融合在了一起，而当时经济学与历史的分离与现在相比并没有那么彻底。当今世界，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都难以跨越西方这些意欲成为普世化思想的范畴和方法所构筑的藩篱，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其研究模式直接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如何打破这种僵局？这是第三部分作者讨论的重点。

第三部分题为“语文学与全球档案”。相比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语文学这一学科通常被认为是真正的史学研究方法。在本书中，作者将语文学研究方法内嵌到全球化与政治化的维度来讨论，作者指出，国家建构影响着对历史的书写，只有将史料、档案的形成过程以及对它们的阐释置于国家建构的历史与演变之中，才能判断语文学是否和社会学及经济学一样，以欧洲为中心。作者首先追溯了语文学的历史渊源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论述这一点时，作者的视角并没有局限在法国或者欧洲，而是从“现代”史学和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开始，通过历史、宗教、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向读者展现了语文学在罗马、波斯、中国、印度、蒙古等地的历史编纂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体现知识的流通对不同国家的重要影响。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运用大量发生在欧洲、美洲、亚洲的史实，论述了亚洲和欧洲的帝国建构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18—19世纪在西方权力之下构建的“他国”历史和底层历史。最后，作者研究了20世纪的档案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从俄国革命到民族独立运动，以去殖民化时期“南方”国家的历史书写作为完结篇章。

作者指出，流通从来都不是对等的。这些流通反映出历史变革中流动着的等级划分：汉人与蒙古人，俄国人与东欧人，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区域的人，等等。这些地缘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等级划分带来了同样被等级化的历史建构。历史分析的不同维度与关于全球性的多种概念反映出全球化的多样性。17世纪见证了欧洲、亚洲、美洲等世界的区域之间如何建立重要联系，西方尚未主导整个世界。历史文献记载了欧洲各帝国、古代中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这些文献通常意在追求世界大同，但欧洲的历史书写彼时已经开始倾向于将“我们”与“他者”对立起来。在这段时期，全球史展现出一场特殊的较量，在这场亚洲帝国与欧洲帝国的战斗中，亚洲帝国吸收了不同世界价值观的精髓，而欧洲帝国则建立了等级制度，用包容（我们）和排外（他者）这样的词汇来思考问题。随着18世纪不同文明间已被划分

开来，历史趋于普遍化的同时也开始受到国家的“管理”。欧洲哲学的价值观影响了历史认知，这些价值观表现出的不是与其他现实的融合，而是一项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化设想。于是普遍主义的一种新形式逐渐出现：它的宗旨不是对不同世界的价值进行归纳概括，而是将欧洲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史就不是发现其他世界，而更像一种文明的模范。欧洲商业、农业以及后来的工业领域发生的“革命”是这些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成为欧洲可利用的一部分，首先是亚洲的纺织品出口到欧洲，之后亚洲又反过来成为英国纺织品的市场。全球化的世界首先是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世界。工业革命增加了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19世纪的民族主义既是对这种革命性的一种普遍性的回应，也是普遍性在欧洲各帝国、古代中国、蒙古、奥斯曼以及俄罗斯等帝国内部的一种延伸。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证实了这一变革：这些国家在与宗主国分离的同时，保留了宗主国的价值观乃至政治制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欧洲主导世界的诠释，也成了思考和实践历史的一个特殊方面。19世纪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又增添了更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社会科学。这些学科继承了启蒙运动的大业，提出了一些地方性范畴和模式，但又想把这些范畴和模式都变成世界性的。欧洲以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出，以及社会政治冲突，都在主要由欧洲刻画的蓝图和思想中逐渐形成。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无论体现在历史学还是在政治学之中，其目标可以说都是为西方主导世界而服务。

在20世纪上半叶，全球史是一部西方的衰落史。作为整体变革的全球史和作为不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全球史，在激进民族主义以及它们对历史的工具化不断高涨的意志面前，逐渐失去了光辉。历史研究的极端民族主义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的悲剧，同时也助长了悲剧的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之上，去殖民化和冷战造就了一种历史，再次有力地将历史与社会科学联系在一起。

在结语中，作者提出，全球史正在面对的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回归，但它可以通过强调世界的不同地区在长时段内紧密联系，来适当削弱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趋势。作者呼吁在历史课程内增加更多跨领域、跨区域的文化交流的内容，号召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增强互动。

整体而言，通过长时段的观察，通过不同世界的交织，作者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探索了历史与哲学、社会学、语文学及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的研究范式相比，这些学科之间的互动跨越了全球史本身的意义。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这种撰写历史的方式得以让人重新思考一些重要事件，以及地区的历史文化意义。这本著作向我们指明，全球史的研究欢迎各种观察角度的历史，同时全球史的观念也超越了历史本身，它着眼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融和汇合。

(责任编辑：张 婧)